

俗化与雅化,从西北汉简看行草书体的生发与流变

■ 赵雁君

中国书法的发展,从字体的萌芽、生成到书体的生发、流变,始终结合着字体、书体的“俗化”与“雅化”,始终伴随着两个发展维度:实用与审美,也就是围绕书法的两个基本属性:文化属性与艺术属性,成为书法创作要把握的永恒命题。

西北汉简,作为汉代墨迹的“活化石”,为我们理解书法的本质与发展规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,特别是观照行书、草书的生发到流变的过程,西北汉简的存在是其重要繁点。

西北汉简中隶书的俗化,是行草书体生发与流变的成因

书体的生发流变,是一个“俗化”与“雅化”不断交替、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,而推动这一过程的基本因素是社会生活的变迁。西北汉简生动地记录了汉代书体演变的“进行时”,完美印证了这一书体生发流变的规律。

西北汉简,主要出自汉代边塞地区的戍边吏卒、书佐等人之手,时间跨度从西汉到东汉,正是中国文字书体由隶向楷、行、草发展的“隶变”时期。这些文字遗存遗迹,其内容多系行政文书、法律条文、典籍抄本等等,是日常实用记事书写的真实记录,其书迹虽非出于“名家”之手的“作品”,但可实证其时行书、草书的“生发”过程。

1. 行书的萌芽:隶书快写与“俗体”的催化

在西北汉简中,行书的雏形清晰可见。吏卒书佐的文书往来、事项记录等日常事务的繁重,促使书写者为了追求效率,在不完全抛弃“正体”(隶书)结构的前提下进行快写“俗化”,对笔画、笔顺进行简化和连带及对其结构自然变形。诸如:笔画的省简和呼应,将隶书典型的“蚕头尾”简化,笔画之间出现了自然的牵丝引带,字内笔势开始贯通;结构的趋便与欹侧,将隶书扁平方整的字形趋于纵长,为楷书的结体“生发”奠定了基础。又因为求快写,字形出现欹侧姿态与动感。这些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的通俗字体(俗体)的广泛使用,正是行书生发的基础,也由此佐证“行书”并非某位名家的凭空创造,而是源于广大书写者共同的实践积累。

2. 草书的生发:隶书的草写与章草的滥觞

西北汉简中的“草书”,也是基于实用书写。书写者为求快速,解散隶体,减省笔画,加强连带,成其“草隶”,即是广泛意义上的“章草”。其特征表现在:隶意的保留,字字独立,波磔笔画形态的隶书笔意依然明显,这是章草的典型特征,也是其区别于后世“今草”的表征;字法的符号化,在书写过程中,通过高度的省简、使转、合并笔画,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草法符号。这种符号化的“俗体”正是章草得以形成的基因。同时,在部分分书率意的简牍中,已能看到字与字之间偶尔的牵带连笔,笔势的纵引已然萌芽,为后期书家革新章草,形成“连笔书”,成为今草、大草书体发展流变的渊源。

西汉简中由隶书“俗化”而来的章草,以及萌芽中的楷书和行书,成为广泛使用便捷的“俗体”或“新体”。其以势为先的书写状态、所蕴含的原始、质朴、率真的书写精神,不断为后世书家提供创作灵感,影响着行草书体、风格的“生发”与“流变”。特别是在魏晋时期,以钟繇、二王为代表的士大夫书家,必然受到前世或当朝民间书写影响,对这些“俗体”“新体”进行提炼、加工、综合等“雅化”,使之法度完备,成就楷书、行书、今草作为“新体”的正统书体地位。

西北汉简的双重属性: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

中国书法自文字的起源到书体的演变,始终



居延新简

承载着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,亦即包含文字信息载体的实用功能与书写过程中的用笔结字规范、风格呈现的审美表达。这两种属性的交织互动,正是书法传统得以延续千年的不竭动力。书法的“实用性”与“艺术性”并非对立,而是同源共生。实用功能是书法艺术的母本,最高的艺术境界往往诞生于平常朴素的实用之中。

西北汉简,书写者并非意义上的“书法家”,他们的书写目的纯粹是为记录和传达的实用功能(文化属性),而非艺术创作。但是,书写者要在狭窄的竹木简上书写,往往要受到材料和工具(窄简、小笔、块墨)的限制,书写时又必须追求高效与节省空间。由此,因书写速度的要求催生了书写技法。笔法,起笔的“露锋”切入,行笔的迅疾果断,收笔的率性出锋或戛然而止,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笔法语言;结体,因字立形,大小错落,欹侧相生,完全打破了标准隶书的方正,在动态中求得平衡,呈现了奇崛的表现力;章法,虽多局限于单行竖写,但字与字之间,通过笔势的呼应和字形的开合,形成了一种内在的、流动的气韵。正因为如此,其笔下无矫揉造作之态,充满了天真、率意、奔放的生命力。这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节奏感、力量感和空间布局,构成了西北汉简“无意于佳乃佳”的天然之美。

西北汉简的启示

西北汉简的存在,如同一个巨大的“书法基因库”,真实记录了行、草书体从实用书写中“生发”出来的全过程,让我们看到书体演变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替代的过程,而是双向循环甚至是螺旋式上升的反复与递进。每一次“雅化”达到极致的“正体”,就会因实用、因审美而催生“俗化”出“新体”;每一次充满生命力的“俗化”革新,最终又会经过文人书家的提炼而走向新的“雅化”。

西北汉简的存在,它告诉我们,书法的生命力源于实用、源于民间,而艺术的高度成于法度、成于文心。西北汉简的历史价值,在于揭示了书法艺术最本真的动力——实用与情感驱动下的书写,打破了“实用”与“审美”的二元对立,凸显了书法艺术最原始的生发机制——艺术生于实用,艺术源于生活。它告诉我们,不应将书法视为僵化的、一成不变的传统,而应视为一种始终与时代生活共进的、活的文化形态;同时要回归追溯到书法的本源状态,关注其背后“人”与“事”的社会环境,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书法的广度与深度,并为当代书法创作找到不竭的灵感源泉。

两千年前的花海汉简返乡 玉门市博物馆展出“汉代边疆的活档案”

本报讯 刘佳 胡露瑶 11月20日,“汉塞长歌——玉门花海汉简与汉塞文物瑰宝展”在甘肃省酒泉市玉门市博物馆开幕,展览由玉门市博物馆与嘉峪关长城博物馆携手呈现,通过文物、图文等多维度呈现,让沉睡千年的汉简在故土焕发新生,重续丝路文脉。

此次展览中,承载汉代河西长城记忆的“花海汉简”回到了玉门家乡。花海汉简在1977年被发掘于玉门市花海农场附近,书写内容涵盖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主题,堪称“汉代边疆的活档案”,目前收藏于嘉峪关长城博物馆。此次受玉门市博物馆邀请,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精选出部分精品展出,部分简牍是首次公开。

除了汉简,展览还汇聚了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精心遴选的53件汉代边关文物精品,涵盖陶器、青铜器、木器、雕砖等多个品类。质朴的灰陶仓、灵动的云气纹灰陶壶,再现了汉代农耕社会的民生百态;纹饰华美的铜镜、锋利的铜镞,诉说着礼制威严与边塞防御的烽火岁月;工艺精巧的木耳杯、刻有生活场景的东汉雕砖,则勾勒出戍边军民的精致生活与精神世界。从生产工具到丧葬礼器,从军事装备到日常饰物,这些文物各具特色,共同诉说着汉代边关的文明高度。

展览特别设置“边塞生活全景”板块,通过“深目”木榻、封检等独特文物,还原汉代烽火台的守御体系与信息传递方式;“汉简中的社会百态”板块则以《仓颉篇》残简、戍卒买布简等,展现汉代教育、贸易的真实面貌。现场辅以图文展板与场景解读,让观众既能欣赏文物之美,更能读懂文物背后的历史密码。

此次展览通过汉简这一载体,让观众触摸到汉代边塞的脉搏,感受玉门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。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2月5日。

同期,“简牍酒泉——酒泉市档案馆博物馆藏汉简特展”也在玉门市博物馆展出。130余枚沉睡千年的河西汉简首次系统性亮相。此次展出的汉简中含有二级文物24枚、三级文物106枚、一般文物5枚,多数出土于汉代长城烽燧遗址,是多元文明交融的见证。

当代简牍书法系列主题特展暨 简牍文物展在湖北展出

本报讯 报艺 为深入挖掘荆楚简牍文化资源,着力赓续中华文脉,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日前,由湖北省文联指导,湖北省书协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的“尚意简牍——当代简牍书法系列主题特展”暨简牍文物展在湖北考古博物馆开展。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张士军,省文联二级巡视员张海旺,省文联副主席、省书协主席孟庆星,省书协驻会副主席、秘书长李劲松,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龙永芳,以及参展书家代表参观展览。

本次展览聚焦湖北出土的简牍精品,同时兼顾其他地域的代表性作品,既邀请当代全国简牍书法名家,又呈现湖北本土简牍书法作品面貌,力图更大程度展现简牍书法的荆楚地域特色。每一件当代的书法作品都对应着数千年前的每一片简牍,都是一扇通往古代的窗口。

书法展览期间,同时展出湖北出土的部分简牍,与书法展览相互呼应,主要分为“荆楚文章”(战国)、“家国天下”(秦)、“日月星辰”(汉)、“望天投刺”(魏晋)及“简牍发掘、整理与保护”五部分,以时间线串联湖北出土战国至魏晋简牍。重点展示云梦、随州等地考古出土汉简,并呈现简牍发掘、整理与保护的全流程。将历史遗存与现代科技结合,串联古今,对传承荆楚文化、讲好地域故事起到重要作用。

此次展览是湖北省“尚意简牍”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,该系列活动包括“尚意简牍·秦风楚韵简上情——全国简牍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”、第二届楚简骨干高级研修班及结业作品展等。



孟庆星 篆书敬事而信中堂